

■ 遗产观察

# 文旅融合探微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

王晶

##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文化旅游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却也长期是颇为禁忌的话题,究其根源在于保护与利用的平衡需要边界,主体不明确、边界不清晰、底线不确定,致使文物受损的同时利用方式受限。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景观遗产和环

## 可持续发展理念中文化旅游的演进

联合国在新千年之际通过《千年宣言》,《千年发展目标》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旅游发展措施的框架。《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超越经济发展的观念下,公正、包容、和平且具生态可持续性的未来有赖于创新发展途径。此后,国际组织开始在各自领域回应和细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文化领域强调本体保护与环境生态、民俗活动、旅游等领域关系,并大力推进跨部门合作。回顾可持续发展目标前后文化旅游理念的变化,对于把握和明确后续具体措施应有助益。

**分离的文化旅游和可持续旅游**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1976 年《文化旅游宪章》认为文化旅游以古迹遗址为目的,意识到旅游对古迹和环境的影响。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性、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强调对旅游负面作用的控制。ICOMOS1999 年《文化旅游国际宪章》认为遗产包括自然和文化环境,意识到当地文化具有旅游吸引力,宗旨包括平衡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并明确可持续发展是应对旅游对社区影响的方式。2011 年《巴黎宣言》更进一步地指出各类遗产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然而,不同遗产的综合保护和旅游尚待其他领域的回应,在 2004 年全球文化论坛的《旅游、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宣言》中,生态旅游仍是独立主题。

**可持续旅游重视环境资源保护** UNESCO、世界旅游组织(UNWT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欧洲委员会在 1995 年可持续旅游世界大会上制定的《可持续旅游宪章》强调自然、文化和人类环境的脆弱平衡,以当地社区为核心等。此宪章提出旅游发展应以可持续为标准,并指出生态、经济、社会公平维度,提出给予脆弱区域特殊优先。此时,可持续旅游主要考虑资源保护,文化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因素。这种观念也体现在后续《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柏林宣言》《生态旅游魁北克宣言》《旅游与气候变化德巴宣言》等国际文件中。

同时,UNWTO 认可文化多样性和变化性所提供的游客体验是重要的旅游资源,环境是文化遗产和活态文化的景观,也在从

## 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需要对文化的深入认识** 中国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可持续发展进程也从环境资源保护起始,2008 年国务院《中国 21 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仍体现着这种观念。2009 年,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前 2007 年《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的立法宗旨和旅游资源范围、性质即明确以自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要,并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指向。

各地在文旅融合方面不断实践,在文化旅游对象多样性和关联性、发展方式和目的等方面的提升离不开对文化的深入认识。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增加了“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统筹规划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资

## 研究方向与应用路径

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对象与范畴较为综合,需要借鉴与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所涉及的研究思路、方向与应用路径也非常丰富。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述及,在此仅就几个主要的方面作一概述。

**资源识别与再挖掘** 如前所述,文化遗产包含有多重价值。除了历史、艺术、科学等内在价值以外,还有诸多衍生价值。“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研究的着眼点,是在于如何从“资源”视角对文化遗产内涵进行再挖掘,以期探究对于当代社会与未来发展有紧密关联、并能够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转化创新的内外部价值。

例如,长达 7.8 公里、贯穿北京老城南北的中轴线,因其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而成为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对这一文化景观类遗产的价值再挖掘,除了从历史维度上深化对其内在价值的认知,还可以基于北京的当代与未来发展,从文化“资源”的视角思考其创新转化的多重价值。从当代北京城市规划来看,可以通过有效措施将中轴线保护区域内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予以疏解,并从文化景观遗产的角度对北京中轴线范围内的人文历史风貌及其物质载体和人居环境予以保护。从未来北京城市发展的视角,则可以立足于首都核心功能的现实需求,通过中轴线文化景观的整体提升进一步强化北京作为首都所承担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等作用。

另一案例就是浙江的“唐诗之路”。这一概念由学术研究破题、发散,通过以“诗”串文,深度挖掘“具有关联性文化价值的遗产”,构建起“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和“瓯江山水诗路”这“四条诗路”文化带,并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赋予文化线路遗产当代的生命力,为浙江的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有力支撑,以提升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质量与效益。

**空间规划与再生产** 中国的大遗址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点,也是长期以来的工作难点。源于文化传统、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一些处于城市核心区的大遗址,遗址区域及其周边都有大量的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但受限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刚性要求,遗址区内居民的发展诉求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等与区外存在明显差距,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大遗址的保护与当地居民权益二者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如何有效化解这一“公地悲剧”困境,是“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探索大遗址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要我们辩证思考两者间的矛盾对立关系,既不能单纯注重“绝对保护”,也不能让遗址保护被当下的短期利益驱动所左右,而是要将“发展”视作遗址保护与居民权益的共同诉求,赋予大遗址所在区域合理、适度的空间再生产能力,并借由国土空间规划等路径予以有效引

导,通过“激发遗产活力—融入百姓生活—带动城市更新”,以平衡保护和发展二者间的需求,促进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在这方面,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通过空间规划的优化与环境的整体美化,使大遗址保护区成为城市中的一片生态“绿洲”和“滋养精神”的文化场域,吸引了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入驻,也带动了周边区域未来乡村的建设,成为杭州的文化新地标。

**文旅融合与产业发展** 文旅融合是文化遗产有机融入社会发展的一条显性路径。文化遗产资源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内涵价值、多样的载体形式,能够被转化成各类旅游体验产品,使人们在具有“沉浸感”和“参与感”的休闲消费活动中获得鲜活灵动的文化体验。不过,文化“资源”不直接等同于文化“产品”,不是通过“圈地”“建馆”就能够完全实现转化的。毕竟,观光型旅游只是旅游产品的其中一种形式,还要深入分析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开发参与型、体验型等不同类别的文化旅游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资源”属性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辨析,探索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若干潜能。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研发,也就不仅仅是由旅游规划等方面的专家独立完成的,还应当有历史考古、文化遗产研究等多学科背景的专家共同参与。

除此之外,正是因为文化遗产具有多重社会“资源”属性,可以将其进一步融入产业发展之中。通过开展“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研究,以“文化遗产”为核心,分析其与相关产业的共生关系和耦合增益效应,以及所具有的牵引/驱动作用,以进一步深化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的再挖掘,培育多渠道、多品种的文化产品链,构建“文化遗产+”的文旅商融业态产业模式,孵化文化遗产阐释转化的文化产业园区、创意设计示范基地,探索集“展示体验、创意设计、特色展售、主题娱乐”等多业态于一身的文化商业综合体,促进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遗产保护与公众共享** “遗产保护”的出发点与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社会发展。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会因为保护的需要而使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受到一些限制,进而引发公众的消极反馈,还有可能出现决策群体忽视公众共享发展成果诉求的现象。开展“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研究,其方向之一就是探讨如何使遗产保护的专业需求与社会公众的发展诉求二者间达到一种相对平衡,以发挥出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社会的更大作用。

例如,大遗址保护和当地居民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利益冲突。为当地居民增权的一个可行途径,就是充分利用大遗址保护政策的显性与隐性红利,在满足遗址本体保护要求的基础上,统筹规划遗址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城乡建设、土地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等职责。

**国家文件重视保护文物和文旅融合の利用方式** 纵观文化旅游领域的国家文件体现了旅游中文物保护和旅游方式改革两方面的要求。2012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把文物保护作为对旅游业的要求,从旅游承载力、文物转让上抵押出让和擅自拆除等方面做了规定。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以文旅融合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草案第 24 条“促进文旅融合”明确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文旅融合对于实现国家发展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作用。文旅融合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旅游收入,而是随之带来的社会文化收益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原因、规律有重要价值,深入反思文旅融合理念,改进实践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现实意义。抓住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和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推进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契机,通过高质量的文旅融合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计划,表明这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遗产国际组织从保护文物本体到关注文化遗产对社会作用的转变。ICOMOS 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以实施《2030 年议程》,其五次会议的主题:文化遗产融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与繁荣、文化遗产与环境恢复、人与和平、政策与合作方,渐次体现了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和全面化。2017 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2021 年 ICOMOS 大会主题为“遗产和我们可持续的未来:研究、实践、政策和影响”,议题包括文化自然的交互关系、可持续性城市、以人民为中心、心理健康和幸福、旅游和创意产业等超越经济发展的内容,反映了它将致力于文化遗产及其相关领域与可持续发展全过程研究的趋势。

2017 年,ICOMOS 国际文化旅游科学委员会审议《文化旅游宪章》,并计划修订为《国际可持续文化旅游宪章》,新宪章拟解决的问题包括过度文化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对居民生活和当地经济的影响等。与《文化旅游宪章》《可持续旅游宪章》相比,可持续文化旅游已发展为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社区经济产生主动作用,并可以通过文化旅游方式的调整来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

持续文化旅游被列入 2021 年世界遗产管理者论坛的目标,支持它成为保护和管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重要手段,并认为能够构建良好的管理环境。至此,文化旅游将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和自然因素与可持续发展连接起来。

**可持续旅游与文化遗产的密切结合** 2015 年世界可持续旅游峰会制定的《世界可持续旅游宪章》已关注到旅游对文化资源的破坏,作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回应,认同旅游是文化遗产的驱动器,呼吁把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融入旅游规划。同年,首届 UNWTO/UNESCO 世界旅游与文化会议召开,标志着推动可持续发展新型合作模式的建立。UNWTO 将 2017 年作为“国际基于发展的可持续旅游年”是它在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减少失业和贫困、保护文化价值和环境等领域推进旅游的标志。2019 年,UNWTO 通过了《本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议》,同 ICOMOS《巴黎宣言》和 UNESCO 对遗产当地的重视形成回应。

**多种遗产的系统保护将成为未来文化旅游的导向和外化形式**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旅游业对经济平稳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的意义重大,并进一步要求旅游业发展方式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以及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自然和文化遗产地。2018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 年,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培育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新增长点,促进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发展,产业多元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条。新发展理念下的文旅融合基于综合性资源保护治理,需要科学合理的文化遗产理念认知,以及更为成熟的部门和央地协调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改造等,使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借力政策红利得以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还应当将大遗址本体的历史文化记忆与当地居民的现代创造等,都看作大遗址空间的“文化层积复合情境”,通过对大遗址区域“文化层积复合情境”的综合保护与价值挖掘,既维系了大遗址空间的文化连续性,也可以让当地居民感受到遗产保护的人文关怀,产生对遗址保护价值和情感的认同。此外,让当地居民参与决策与日常管理,形成常态化的多方参与协商共管机制,也会使支持大遗址保护的当地居民感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可。

公众共享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让文化遗产走出象牙塔,通过各种活动形式和媒介走近公众。这就需要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既要“清心守正”,秉持自身的专业职责与历史使命,又要怀着“兼济天下”之心,思考专业研究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意义,承担起助力社会进步发展的责任。

**遗产价值的当代创新** 文化遗产之所以具有特定的价值,是因为其所承载的信息揭示了文化发展脉络,或与人类相关的自然生态演变。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遗产本体与其所蕴含的显性或隐性信息是同等重要的。遗产价值当代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内涵认知的科学研究、信息获取与保存、文化遗产基因解码与再挖掘。

近年来,数字化展示技术在一些考古大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得到了深度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一些直观可视性欠佳的大型考古土遗址,可以采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技术,数字沉浸式互动展示等不同方式,赋予生硬的遗址以“鲜活的生命”;还可以与时俱进“全息远程呈现”“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动态,并适时引入考古遗址的展示之中,以提升远程观众的文化体验。

对于我国丰富的古代书画资源,则可以通过数字化信息采集与标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识别等方式进行艺术风格解码,对书画作品的布局特征、运笔技巧、用色习惯等进行规律性识别,建立起古代书画风格对比研究数据库,既可以将其应用于古代书画的作品辨伪、作者风格分析,以及艺术史等领域的专业研究,也可以对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元素提取凝练,进行艺术再创作。

此外,借助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成面向中小學生、寓教于乐的参与式益智应用场景,为“双减”背景下的中小学校提供更多的素质教育选项;研发构建于区块链技术之上的 NFT 文化产品等,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文化遗产衍生信息的资源潜能。

文化遗产与数字化技术的紧密结合,还将产生强劲的“耦合增益效应”,通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产生增力,形成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文化遗产+创意产业”“文化遗产+旅游康养”“文化遗产+研学教育”“文化遗产+休闲娱乐”等跨界融合,实现“1+1>2”的协同叠加效果,进而通过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杠杆放大作用,带动相关产业业态重塑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完)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上接 2 月 10 日 6 版)

# 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初论

张颖岚